逻辑在刑事审判中的应用

徐海燕

(中国政法大学逻辑学研究所,北京 102249)

摘要: 刑事审判工作分为定罪和量刑两个阶段, 刑事审判的过程离不开逻辑的支持。本文从法律逻辑的角度论证并分析了逻辑推理在刑事审判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审判三段论; 定罪三段论; 量刑三段论

中图分类号: B81 **文献标识码:** A

定罪和量刑是刑事审判活动中的两个重要问题。我国司法机关历来强调, 处理刑事案件必须作到定性准确、量刑适当, 这也是衡量办案质量优劣的两个重要标志。定罪是根据罪名概念对某一具体罪行定出罪名, 量刑是对某一具体罪行的主体处以处罚。定罪和量刑都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而事实一般都是用直言命题反映的, 刑法条文主要也是直言命题, 所以定罪、量刑的推理主要是直言三段论。定罪时使用的三段论称为定罪三段论, 量刑时使用的三段论称为量刑三段论, 合称为审判三段论。

(一) 有关定罪的逻辑问题

在定罪、量刑这二者关系中, 首先要考虑定罪问题。定罪是量刑的基础; 定罪不准确、不严密会产生很多司法疑难问题; 定罪是司法机关处理每个刑事案件都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经过对案件的审理, 司法机关必须正确确定, 对被告人是否应当定罪? 定什么罪? 是一罪还是数罪? 是犯罪既遂还是未遂? 等等。可以说, 对案件的一切侦查、审讯活动都是最终为上述问题提供可靠的证据。

定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审查案情; (2) 寻找相关的法律规范, 在刑事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已经确凿、充分的条件下, 寻找所要适用的法律条款; (3) 将犯罪事实与所要适用的法律条款进行分析、比照, 确定罪名。这三个阶段是互相联系、不能分离的, 这就是定罪三段论。

下面我将从犯罪概念的外延方面和内涵方面来分析定罪过程。从外延方面看, 我国刑法条文中有许多基本的概念, 如犯罪、故意犯罪等。其中反映每一种犯罪的概念是罪名概念, 如抢劫罪、盗窃罪等。罪名概念是反映犯罪行为本质属性的概念。它是刑法中最重要的概念, 是衡量一种行为是否犯罪、犯什么罪的具体标准。我国刑法分为总则和分则, 总则中首先将犯罪行为划分为十种罪行: 危害国家安全罪, 危害公共安全罪,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侵犯财产罪,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危害国防利益罪, 贪污贿赂罪, 渎职罪, 军人违反职责罪。每个罪名就是一个类罪名概念。在分则中, 将这十种罪行又各自划分为若干罪行, 如危害公共安全罪又划分为放火、投毒、爆炸、决水等罪, 每个罪名就是一个具体罪名概念。将刑法中规定的犯罪行为划分为十种罪行, 这是第一次划分; 将十种罪行各自划分为若干罪行, 这是第二次划分。在这两次划分中严格遵守了划分规则: 每次只按一个标准划分, 子项穷尽母项, 子项之间互不相容。而犯罪概念和类罪名概念之间、类罪名概念和具体罪名概念之间是母项和子项的关系。如危害公共安全罪在第一次划

分中和危害国家安全罪、贪污贿赂罪等罪之间是全异关系，和第二次划分后所得的放火、投毒、爆炸、决水等罪之间是母项和子项的关系，而放火、投毒、爆炸、决水等罪之间又是全异关系。而母项和子项的关系可以归为属种关系。母项是属概念即类罪名概念，即第一次划分所得罪名概念，如侵犯财产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子项是种概念即具体罪名概念，即第二次划分所得罪名概念，如危害公共安全罪子项就有放火罪、投毒罪等。犯罪概念、类罪名概念、具体罪名概念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外延来说，具体罪名概念的外延完全包含在类罪名概念的外延中，类罪名概念的外延又完全包含在犯罪概念的外延中；就内涵来说，犯罪概念的内涵包含在类罪名概念的内涵中，类罪名概念的内涵又包含在具体罪名概念的内涵中。在司法工作中了解这种关系对定罪有巨大意义。当确认某人的行为是犯罪以后，就要根据侵犯的客体决定它属于十大类犯罪的哪一类，然后根据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罪状确定其具体罪名。在司法工作中不允许以类罪名概念定罪。因为只把某人的行为归属于某个类罪名而没有把它归属于某个具体罪名，就不能不使人怀疑认定的可靠性。每个类罪名概念下面都包含有若干具体罪名概念，类罪名所指称的犯罪行为对同一个人来说，有的可以为同一个人同时实施多种犯罪行为，有的则不可能同时被同一个人所实施。如果仅将某人的行为归属于类罪名，那就意味着这个人实施了该类罪名包含的多种行为，这不仅在逻辑上说不通，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如渎职罪中的徇私枉法罪和放纵走私罪在同一时间、同一条件下就不可能由同一个人实施，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司法工作人员又为海关工作人员。不允许以类罪名定罪也因为刑法只给具体罪名规定了刑罚，而没有给类罪名规定刑罚。用类罪名定罪将会给量刑带来困难，为了方便量刑必须用具体罪名定罪。当我们已确定某人的行为属于犯罪行为后，就应该准确地将其归属于某个类罪名，然后再将其归属于这个类罪名下的某个或数个罪名，这样对某人犯罪行为的认定才说得上是可靠的，才能援用相关的刑法条款进行判处。不属于任何具体罪名反映的、超越于具体罪名概念之外的抽象的犯罪行为是不存在的。

从内涵方面来看，具体罪名概念的内涵包含了它的类罪名概念的内涵，也包含了总的犯罪概念的内涵。当我们确定某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某个具体罪名反映的对象时，首先就应考虑这一行为是否符合总的犯罪概念的内涵，只有当其符合了犯罪概念的内涵时，才能考虑该行为是否符合某个类罪名下属的某个具体罪名的内涵。司法工作中不允许以类罪名定罪，但也不能跳过类罪名，仅仅根据某人行为的表面现象直接地将其归属于某个具体罪名，否则会混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导致定性不准，也违反了定罪过程的三个阶段。因为定罪过程首先要查清案件事实，找到类罪名概念，再确定具体罪名概念。比如有这样一个案例：某县农民陈某某为泄私愤，用农药毒死费某家的一头母猪和两头小猪。对此，该县公安局认定为投毒罪。投毒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必须具有“危害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或重大的公私财物安全”的内涵。可是这个农民的行为明显地针对特定的个人实施的，哪里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呢？案件报到该县检察院，检察院也觉得不妥，于是改为，该罪属于“侵犯财产罪”类罪名下的一个具体罪名。该罪的内涵是“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牲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这个农民虽然投毒毒死的是生产资料，但他的行为并不构成破坏生产经营，又怎能具有“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内涵呢？检察院虽然正确地确定了类罪名，但却用错了具体罪名。所以在对某个人的行为定罪时，首先要考虑该行为是否符合总的犯罪概念的内涵，然后从大的方面找到适当的类罪名概念，在类罪名下属的许多具体罪名中确定相应的一个。比如这个农民的行为符合侵犯财产罪内涵，就应首先归属于侵犯财产罪类罪名下，然后再归属于故意毁坏财物罪。

以上是从犯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两个方面来分析定罪过程。下面我将从逻辑要求的角度分析定罪三段论。定罪三段论的特点是，大前提总是援引法律条文，小前提是犯罪事实，结论是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的定性，定罪三段论要遵守三段论的所有规则。它容易发生的错误是在小前提方面，即认定事实不准确。如果作到对事实的正确认定及推理形式的正确使用，加上由法律条文构成的大前提，那么一般说来定罪三段论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很小。

在定罪过程中始终要遵守逻辑规律。按照同一律的要求，首先对罪名概念要正确理解。罪名概念是给某一罪行定罪的依据，如果对罪名概念的理解不准确，定性就会不正确。司法工作人员对罪名概念的理解要与原条文的精神保持同一，不能错误理解罪名概念，更不允许为达到某种目的私自歪曲、篡改法律条文。有时类罪名确定了，对其下属的具体罪名概念也要仔细斟酌，不能用错。因为同一类罪名概念下的具体罪名概念所带来的法律后果也是各不相同的。比如这样一个案例：某案犯从十三岁就开始小偷小摸，十五岁时因经常扒窃被少教二年，期满后不久又继续盗窃，被当场抓获。某法院将其定为惯窃，后经二审法院改定为一般盗窃，因为按照刑法司法解释要求，惯窃的内涵是：以盗窃为常业或以盗窃行为为主要生活来源。而这个案犯是个待业青年，生活主要靠父母供养，盗窃的目的是想吃穿得好一点，不符合惯窃内涵；且又因为未满十八周岁，应从轻处罚，所以二审法院改为一般盗窃。所以在定罪时一定要按照同一律的要求，对罪名概念的含义要正确理解，对每一个罪名概念的内涵都要认真研究，要分清它们之间有时是细微的差别，如抢劫罪、抢夺罪，只相差一个字，可内涵和法律后果却有不同，二罪的共同特点都是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都有抢走他人财物的行为。但抢劫罪的抢是在当场对他人使用暴力、威胁或其他方法，使被害人在不敢、不能或不知反抗的情况下实施的，而抢夺罪的抢是乘人不备、出其不意地夺取他人财物。所以要准确理解罪名概念。

同一律还要求认定事实和所定的罪名要同一，定罪选择的法律条文要适当，犯什么罪，定什么罪名；定什么罪名，就要在客观上有相应的犯罪事实存在。比如前面案例中的农民陈某某的投毒行为应属故意毁坏财物罪，就不能想当然地因为他实施了投毒行为就定为投毒罪、因为他毒死了牲畜就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犯罪事实必须符合某个罪名概念的内涵时，才能认定为是那种犯罪，否则犯罪事实和罪名不符，就违反了同一律，影响了法律工作的严肃性，给定性、量刑带来很多偏差。比如若将农民陈某某的投毒行为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投毒罪，依据《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若定为“侵犯财产罪”下的破坏生产经营罪，依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正确认定为故意毁坏财物罪，依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见，定不同的罪，处罚结果有多大区别。定性时差之毫厘，量刑和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就会差之千里。定罪畸轻、畸重都会带来不良后果，定罪畸轻，会纵容坏人，难以起到惩罚和警戒作用；定罪畸重，有时会给承受者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威严性，都不能取信于民。

同一律还要求要依法确定罪名，使用法定罪名，不能任意创造罪名。比如在一个毁人容貌案中，凶手李某因其女友欲与其中断恋爱关系而怀恨在心，用匕首刺伤对方面部，留下永久疤痕。这种犯罪行为按照刑法中的法定罪名应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的故意伤害罪，但某检察院的起诉书写着“毁人容貌罪”，这种罪名是刑法中没有规定的，乍一看好像是罪名很合情合理，反映了案件事实，实则不然。如果可以任意创造似是而非的罪名，那么每年有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案件，将要创造多少罪名！给法律工作带来多少混乱！所以定罪时，一方面定性要准，另一方面要使用法定罪名，保持刑法的严肃性；罪名依法确定后，在使用过程中也要保持同一。不能开始用这个罪名，后来又变成另一个似是而非、差不多的罪名。如在李某毁人容貌案中，先将其称为毁人容貌罪，后来又变成致人重伤罪，这都是不应该的。

定罪的根据是法律条款，必须依法定罪；定罪的另一个根据是案件事实，一定要有案件事实，才能定罪。不能颠倒定罪三个阶段，不能先定罪，之后再查找甚至是捏造案件事实。“四人帮”所制造的冤假错案基本上都是先捏造莫须有的罪名，再捏造案件事实。他们迫害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用的就是这种手法。先有案件事实后定罪，这也是定罪三段论的推理形式要求的：所有三段论要求从前提推导出结论，定罪三段论所定罪名是从犯罪事实和所使用的法律条款推演而出的，先有结论后有前提的三段论推理是不存在的。

按照矛盾律和排中律的要求，在定罪过程中要严格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受害人与作案人及其他当事人的界限，不能混淆是非、含糊其辞，否则会产生自相矛盾、模棱两不可的错误。如在一份法院的判决书中，先是断定三案犯轮奸某女青年，随后又断定三案犯与该女青年在同一晚上乱搞两性关系，共同进行淫乱活动。最后判处三案犯聚众淫乱罪、强奸罪，判处该女青年聚众淫乱罪。同一犯罪活动既是聚众淫乱，又是强奸，同一女青年既是被害人又是同案犯，这就造成思想混乱、自相矛盾。诸如此类的错误应该在逻辑规律的要求下坚决避免。有时一个人可能实施多种犯罪行为，在定罪时要求每定一个罪名都要有相应的犯罪事实符合所定罪名的内涵和外延，每一种行为定一种罪，各犯罪行为的外延要划分清楚，不能混在一起、不分彼此，因为逻辑规律要求表达思想要有确定性和有效性。

（二）有关量刑的逻辑问题

与定罪推理紧密相连的是量刑推理，就是根据刑法相关条款得出判处结论的推理。定罪、量刑二者关系密切，定罪是量刑的前提，定罪后才能决定适用刑罚的量刑幅度，只有最终实现了量刑，定罪才能得以执行。定罪的过程，是着重考察被告人的行为事实是否与某个罪名概念的内涵相符，能否归入某项刑法条款适用的范围，运用的难度表现在对案件事实的确认方面；而量刑的过程，则是在已确定适用的刑法条款规定的范围内，全面考察被告人的行为事实、后果，决定给以何种制裁处理的过程，运用的难度表现在如何决定量刑的逻辑范围。犯罪事实定性后，就要援引刑法条文判刑。援引刑法条文判刑的过程是一个量刑三段论，这种三段论的大前提永远是刑法条文，小前提则肯定具体罪行属于刑法某一条文所规定的犯罪（既定罪三段论的结论），结论是对犯罪人所判之刑。量刑三段论也要遵守三段论规则，它的大前提是法律条文，小前提是定罪三段论的结论，所以如果定罪三段论正确，推理形式正确，那么量刑三段论犯错误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对一个案件定罪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量刑问题。在类罪名下有许多具体罪名，各具体罪名之间、甚至是同一具体罪名内量刑的幅度也是不一样的，这就为确定具体刑罚带来了困难。在刑法条文规定了单一量刑幅度的情况下，确定量刑幅度比较简单；在刑法根据犯罪的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而规定数个相互衔接的具体量刑幅度的情况下，确定量刑幅度就要复杂一些。此时定罪以后，虽然解决了适用刑罚的整个条文规定的法定刑范围，但不能直接以此作为量刑的幅度。因为有的罪名下量刑幅度很大。比如投毒罪的量刑幅度，《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对这类情况必须深入分析，全面认定其犯罪的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的程度，在整个条文规定的数个量刑幅度中，选择一个与其犯罪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的具体量刑。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审判员在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或制裁范围内，可以作出选择，而且选择哪种处理方式似乎是自由的。其实这种“自由选择”的背后，隐藏了许多复杂因素。运用量刑推理的难度就难在这种自由选择上。审判员无论作出何种选择，都应有充足的理由证明，为什么选这种而不是那种，都要说明选择的合理性，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因为同一律要求，在定罪、量刑的过程中，二者要保持同一，定什么罪量什么刑。定罪和量刑的同一，还表现在定罪阶段和量刑阶段的同一，二者不能颠倒，不能先量刑后定罪，因为量刑三段论的小前提是援引定罪三段论的结论，量刑是从所定罪名和所适用的法律条款推演而出的，否则既违反逻辑规律也违反刑法程序。

同一律还要求量刑和量刑情节要保持同一。量刑时引用的条文要适当，量刑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是区分罪行轻重、从而决定量刑轻重的主要标

准。犯罪现象十分复杂,同一性质的犯罪乃至同一案件的犯罪人其犯罪情节也往往各不相同。所以刑法根据犯罪情节、对社会危害性不同分别规定了轻重不同的法定刑,如: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构成犯罪的,适用基本法定刑;情节较轻的,从轻刑罚;情节严重的,从重刑罚;情节特别严重的,适用最重的刑罚;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免除刑罚处罚。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为选择量刑幅度提供了一个确切的逻辑范围,为正确量刑提供了一定保证。确定了量刑幅度只是保证量刑适当的第一道工序。第二道工序就是继确定量刑幅度之后决定基本刑,就是暂不考虑从重从轻处罚等各种情节,仅根据犯罪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程度,在一定量刑幅度以内判处的刑罚。基本刑不是在量刑幅度中间线上判处的刑罚,它存在于每个量刑幅度范围内的任何一点上,上至最高刑,下至最低刑,只要与犯罪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就是基本刑。犯罪现象十分复杂,不仅不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千差万别,就是同一种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也不相同,其基本刑自然也不一样,正确决定基本刑,是搞好量刑工作的关键之一。而且基本刑是从轻从重处罚的基准点,不确定基本刑,就无法从轻从重处罚;基本刑不准,偏高或偏低,也会造成从轻从重处罚失当,这都是违反同一律的。第三道工序就是考虑量刑情节,即依法决定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这样在刑法体系中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有效的量刑系统,并且还体现了量刑推理系统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在刑法分则中规定了法定刑,确定了量刑逻辑范围,使量刑不至于严重偏颇;同时法定刑又有着较大的幅度,有的条文还规定了两种或三种量刑幅度,量刑时具体适用哪个刑种,确定什么基本刑,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酌情决定。这些都是我国刑法在量刑方面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表现,但是这种灵活性是法律规定的灵活性,具体运用时必须遵守量刑的一般原则,防止以任何借口随意滥用,甚至是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否则也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就是我国刑法要求的量刑和量刑情节的同一。

在量刑三段论中,同样要遵守矛盾律、排中律,不能出现自相矛盾、模棱两不可的错误。定此罪、量彼罪刑,或依据的是偏重的处罚方式,而结论却是从轻的处理方式,等等,都是违反逻辑规律和刑法精神的。

参考文献

- [1] 雍琦.《审判逻辑简论》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年2月
- [2] 朱武.《刑案逻辑解析》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5年
- [3] 阳作洲.《办案逻辑》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87年
- [4] (美)James E.Band,郭国汀译《审判的艺术》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年

Logical Reasoning In The Criminal Trial Work

Xu Haiyan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2249,China)

Abstract: Criminal trial work divides to judgement and penal discretion two stages,criminal trial process can't depart the support from logic.The paper proofs and analyses the important function of the logical reasoning in the criminal trial process from the legal logical point of view.

Kew words: trial syllogism; judgement syllogism; penal syllogism

收稿日期: 2003-1-9

作者简介: 徐海燕 (1968-), 女, 中国政法大学逻辑学研究所, 讲师